

# 五十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

陳運棟

## 目次

- 一、前言
- 二、客家族群
- 三、客家研究的開端
- 四、近代的客家研究
- 五、日據時期的客語研究
- 六、臺灣的客家研究
- 七、大陸的客家研究
- 八、結語

## 一、前言

客家族群雖為臺灣第二大族群，然而在臺灣的歷史上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定位與重視。就以反映當地歷史的史書來說，臺灣方誌中能如實反映客家史的少之又少。桃、竹、苗三縣是目前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二）刊行的《淡水廳志》敘及客家人和客家地區篇幅極少；甚至連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新竹縣政府刊印的《新竹縣志》似乎也找不到幾則和客家人相關的紀錄。撰寫桃、竹、苗地區史書的人，似乎沒有覺察客家人的存在。因此研究臺灣史的學者才有：「在臺灣的地方志中發現有關客家史的論述，就令人有彌足珍貴之感」的歎語（註一）。

在不受重視，找不到史料的情況下，光復後一直到民國六十年代，臺灣的客家研究，除了客家雜誌「苗友」、「中原」刊載介紹性的篇章外，似乎沒有系統性的研究，當然也就談不上研究成果。為了使讀者全面瞭解整個客家族群研究的來龍去脈，本篇的敘述不侷限於臺灣的客家研究，也把客家族群相關的研究工作，一併包含在內，作一考察。

## 二、客家族群

客家族群是漢民族中一個系統分明而很有特點的支系。客家先民原來主要是居住在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的漢族人民。由於戰亂和天災的驅迫，他們背鄉離井。輾轉遷徙，備嘗艱辛，終於紮根閩粵贛邊的廣褒山區中，與閩粵贛邊的原住民交流融合、混為一體，形成為一個特別吃苦耐劳，特別團結的族群。客家族群形成之後，又在宋元以來的歷次中國大事變中，表現出愛國愛鄉、敢於奮鬥、勇於犧牲的精魂，在歷史發展中一次又一次的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這樣的過程中，客家人也一次又一次的鍛鍊了自己使自己變得更堅強不屈，更有進取心，更有適應性。

因此，客家學界的共同認識就是客家先民是古時南遷的中原漢人。中原漢人南遷，有史料記載者始於秦代，但不是所有南遷的中原漢人都是客家族群的先民，它還包括了廣府、福佬等族群的先民。客家先民自中原遷居南方，一般認為



大的遷多有五次。第一次大遷移從漢末至東晉，受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和東晉「永嘉之亂」影響，中原漢人南遷至長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陽湖和太湖三大區域，但到達鄱陽湖區域的中原漢人才是直接的客家先民。第二次大遷移從東晉至五代，受安史之亂八年、黃巢之亂十幾年和五代紛爭的影響，漢人從長江流域主要是鄱陽湖區域南遷到贛南和福建汀州地區。到達這一地區以後形成了客家族群，所以以後三次大遷移實際上是客家族群的擴散。第三次大遷移是宋元朝代，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的一部份又由閩贛分遷至粵東粵北。第四次大遷移是在明末清初，明末政治腐敗，又值連年荒災，後來清兵南下，大批客家民衆分遷至粵中及濱海地區，及至川、桂、湘、臺灣，且有一小部份遷至貴州南邊及西康之會理（今屬四川省，靠近雲南省）。第五次大遷移是在清代，這次客家人的遷移屬於世界範圍的遷移，受廣東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部份客家人分遷至廣東南路、海南島、臺灣、香港、澳門、南洋群島、甚至遠至歐、美各洲。其他零星遷移在歷史上從未間斷。通過上述歷史性遷移，而今成片客家人居住並講客家方言的省份有廣東、江西、福建、廣西、湖南、四川、臺灣、海南八個省區二百多個縣市，其中閩粵贛交接地區最爲集中（註二）。

有關客家淵源，客家學界也存有三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認爲客家人的祖先從中原遷來，「是純粹的漢族」。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可能是多數，因爲從第一次大遷移到第二次大遷移到達贛南和福建汀州地區並定居下來形成客家群體經歷了五百年以上的時間，超過了二十代人，不可能不與與當地土著居民通婚融合而保持純粹的中原漢族血統。

第二種觀點是客家族群以漢族爲主體，承認與古百越族的支系畚、瑤、苗、蛋等族特別是畚族通婚和血緣交融。持這種觀點的人占多數，認爲客家本來就是生活在北方的「土著」居民，漢族中的一支族群「司豫流人」。在漫長的往南遷徙過程中與百越諸族互相交流，互相影響和互相融合，有的轉化爲漢民族的其他族群或其他民族的成員，有的則在交流過程中影響和融合了別的族群或民族的居民，保留了客家的本色，即今日遍布海內外的客家人，根據這種論點，除了強調客家族群以漢族爲主體以外，似乎認爲是客家人南遷而不是中原漢人南遷並與其他民族融合形成客家族群。這與前面提到的共同認識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種觀點是較少數的中原漢人帶著當時較發達的中原文化融化於南方較多的古百越族中，形成以中原文化的爲主體的「客家共同體」。也就是說，客家族群在血緣上古百越族的一支族成份大於漢族，提出這種新觀點的人是大陸學者房學嘉，他指出：「歷史上散居於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少數中原人跟當地古百越人等少數民族婦女通婚，建立家庭，其後代的語言。文化習俗自然跟隨母親的民族，此即客話叫阿姆話之故。客家話的母語是閩粵贛三角地區古百越族語。客家話中夾有相當多中原古音，則是南遷的中原漢人帶來的。由於南遷的漢人因閩粵贛山區訊息閉塞，交通落後，其人數任何時候與當地土著相比都是少數。中原漢人由於文化素養較高，往往自命不凡，……」。客家共同體由古越族遺民中的一支與歷史上南遷的中原人融合、漢化而形成。「歷史並不存在客家中原南遷史。」「古越族人口基數大。根據生物進化規律，應是越族人同化了中原流人。而屬於少數的



中原流人則用中原科舉文化教化了客地人民」(註三)。

第三種觀點一經提出即受到大陸客家學界的質疑，紛紛指出這種把客家主體說成是古越族的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去年(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廣東省梅州市舉行的「客家淵源與客家界定」學術研討會，經過熱烈討論與會學者一二四人，在客家淵源及客家界定問題上，普遍肯定下述三種觀點：1.客家根在中原。客家是遷入閩粵贛三角區的中原漢人，融合原居地的百越族後裔(主要是畚瑤族)形成的一支漢族族群，其主體是中原南遷的漢人。2.客家形成的地域在贛南、閩西、粵東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區。故學者所指稱的「客家搖籃」或「客家大本營」是閩粵贛三角區客家的整體，而不是某一局部地區。閩粵贛三角地區在客家族群形成和發展過程的各個歷史階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贛江、汀江、梅江都是孕育形成客家族群的「母親河」。3.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和《客家源流考》，為客家族群形成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基本觀點經得起歷史考驗。存在某些缺陷或不足，是繼續完善的問題，而不應全盤否定(註四)。

客家人存在的歷史不受到重視自古皆然，其中含有太多太錯綜複雜的因素。從可資查詢的文獻來看，客家人具體形成，最關鍵的年代應該是中國的南宋末年，客家人為了逃避元朝的武力，南遷至中國粵東山區以後，一直採取「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深，但是他們的衣冠文物，仍然襲用宋代的規則，連建築房屋也仿照中原時代的小型宮室。中上之家都是前中後三座落，左右二列橫屋，看來十分寬敞整齊。」(註五)元朝覆亡之後，客家人依舊避居粵東山區，跟官方

少有往來，直到明代末葉，先有沿海地區的流寇之禍，不久之後滿清入關，「逼近閩粵之際，客家節義之士，多起兵勤王，抗爭失敗，無法留居原地，而被迫遠走他方。」(註六)之後，又有清順治年間的「遷海覆界」政策，限令閩、粵、江浙等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使得沿海地區徹底堅壁清野，主要的目的雖是為斷絕鄭成功的後援，卻使得沿海地區的居民顛沛流離，粵東地區的客家人首當其衝，生活陷入困境，也只得流亡異地……這幾百年的變遷與流離，讓這一支自南宋形成的族群，在擁有廣大領土的中國政府眼中，不過是眾多少數族群中的一支，甚至是較不合作的一支，自然不易受到統治者的正視與重視。

明朝末葉，鄭成功渡海來臺灣，同時帶到臺灣的，就有二萬五千兵士以及五千家眷，到了永曆十八年(一六六四)鄭經又率領了六、七千名兵士和若干家眷渡海而來，其中自然包括了原籍汀州府長汀縣賴坑客籍人士劉國軒的子弟兵，「另外沿岸各島招聚運往臺灣的『閩粵無賴子弟』也不少。增產糧食和擴充兵員是鄭氏政權的至上要求。」(註七)

明鄭覆亡後，在靖海侯施琅的力陳正下，清廷勉強同意繼續治理臺灣，但先是頒佈了〈臺灣編查流寓例〉，把單身無業的「流寓者」，強制遷回中國原籍，接著又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頒佈相關的渡臺禁令，「有人說這是出於施琅的私怨。施琅是福建省晉江縣人，他跟先當海盜後來幫助鄭軍的潮州地方客家作戰，吃了不少苦頭。」(註八)，連橫的《臺灣通史》更直接指出：「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來。」(註九)。



施琅的影響固是事實，然而粵東之地自明季以來，一直都為海盜的淵藪，也是事實，這諸多遠因與近果，自然使得新的當權者，對於客家族群築起更高的圍堵之牆，渡臺禁令便是希望把客家人規範在粵東山區，以免到了臺灣，更肆無忌憚地跟海盜勾結，造成更大的禍害。

渡臺禁令是頒佈了，違反者一律嚴懲，可惜卻起不了什麼大作用，「商船水手，多空缺數名，所以私載無照客民而獲其利者也……出口入口，文武弁員，因為利，如鹿耳門查驗，每空名例銀五錢，惟恐其不多耳。無照客民，或為盜賊，風大人少，或至覆舟。通同作弊，可為浩歎。」（註十）

利用各種管道，偷渡來臺的客家人，大家聚居一處，以利彼此照顧相助，只是這些「客子，在中國福建浦人藍鼎元的眼中卻是：「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的人赴臺傭雇佃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朋比為黨。睚眦小故。輒嘩然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自晝掠人牛鐵鐵印重烙以亂其號。（臺牛皆烙號以防竊盜，買賣有牛契，將號樣註明），凡牛入客莊，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為盜，易己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辦，多墮其計。此不可不知也」（註十一），藍鼎元也進一步分析客家人在臺種種不當行為的緣起以及防治之道：「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群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係累，欲其無不逞也難矣。……凡客民無家眷者，在內地則不許渡臺；有臺有犯，務必革逐過水，遞回原籍。有家屬者雖犯勿輕易逐水。則數年之內，皆立室家，可消亂萌」。（註十二）

明鄭時代，有潮州客家人投身鄭家軍麾下抗清，使得清

初客家移民想橫渡臺灣，必須付出更艱困的代價；清領之後，數百或數千聚居一村的客家人，又被輔佐藍廷珍平定朱一貴事件的重要幕僚藍鼎元視為：「結黨尚爭，好訟樂鬥，或毆殺人，匿滅蹤跡，白晝掠人牛，莫敢過問」，（註十三），之輩，顯見執政者對他們的成見已深；儘管「辛丑朱一貴作亂，南路客子團結鄉社，奉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民銀兩，功加職銜。」（註十四），但這僅是清廷治理臺灣的一種手段而已，並不表示當政者和臺灣客家人之間的關係有所改善，當然更不能做為重視客家人的指標。

客家族群形成以後，和統治者的關係始終不怎麼和諧，甚至經常是敵對的角色。只是這些人僻居在遙遠的南方，勢力又不夠強大，朝廷也許曾經對這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厭惡，卻很難讓統治者正視（重視）過他們的存在。

來到臺灣的客家人，角色跟在中國原鄉的族人扮演得差不多，無論這些人如何念念不忘著「出身中原」的「正統」身份，又如何強調自己是「大漢民族精華」的角色，在統治者看來，不過是一群「結黨尚爭，好訟樂鬥」的傢伙；既使在往後的一些民變事件中，客家人也曾數度扮演過「義民」的角色，皇帝所頒的「忠義」，或「懷忠」匾額是讓某些客家人（家族）奉為至寶，甚至直到現在，都不斷拿出來做為榮耀的表徵，事實上卻無法改變清廷對於客家人的漠視態度。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禁止客家人渡臺的命令開始鬆動了，但這並不表示單獨賜給客家人的恩寵，早在一年前，乾隆皇帝就詔准漢民攜眷渡臺；更準確一點的說，乾隆以降的海禁政策，其實已經無法禁絕如潮水般湧到臺灣的偷渡者，清皇朝也得順應大勢所趨，廢止有名無實，起不了什麼



作用的「渡臺三禁」。

總而言之在大陸不會受到重視的客家人，在臺灣有清一代也沒有受到正確的定位。除了比較大規模的墾拓或者民變事件，一般的志書中，甚少提及客家的史蹟，偶而出現的往往是某個事件的背景說明，不然就是語焉不詳的簡單敘述，使得後人無法從清代的志書文獻中，看到客家人從墾拓、變遷與發展。這個臺灣的第二大族群，就這樣進入了歷史的泥淖中，慢慢隱沒而成了不起眼的族群。

在臺灣客家族群，與漢族裏的第一大族群——福佬族群，始終站在尖銳對立的立場。清代道光年間恩貢生林師聖論及閩粵分類時說：「臺地閩人多而粵人少，閩人散而粵人聚，閩人貪而愚、粵人狠而狡，故粵人常專逞志於閩人焉。每叛亂，多屬閩人，而粵人每據上游，籍義毒肆生靈，甚於叛賊。且粵莊既多，儲糧聚衆，以竹爲城，以叻爲池，磐石之安，孰逾於此。閩人攻且多，復放耕牛、農具、衣服等物，散布於路以餌之。而伏人於僻近棲莽間，閩人利其有，大肆搶奪，伏起殺之。故閩人多死焉。其禍自朱逆叛亂以至於今，仇日以結，怨日以深，治時閩欺粵，亂時粵侮閩，率以爲常，冤冤相報無已時。」（註十五）

### 三、客家研究的開端

客家研究開端於土客械鬥。客家先民南下，經過長期的艱辛拓殖，經濟發展迅速，人口劇增，原有的山多地少的社區，已不足以繁衍生息，遂有向外擴張之勢；另外，當時的統治集團對客家人實行歧視政策，更加劇了土客矛盾，致使閩粵地區土客械鬥事件的時有發生，常時較有見地的學者，

恐其交惡不休，致傷民族和氣，便有一些有關客家的源流及其語言習俗的講述。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年）執教於惠州豐湖書院的徐旭曾，便以土客械鬥事例向門生講述客家與漢族其他不同之緣由，後成文收入《和平徐氏族譜》，旭曾《豐湖雜記》有人說《豐湖雜記》是一篇「客家人宣言」，該文雖短，僅一千餘言，但論及客家源流，語言及風俗等諸多方面，爲客家意識的最好寫照。（註十六）客家人有了這種族群意識才可以保持自己的共同的社會，文化特點和價值觀念。就其內容看來客家意識包含以下諸端：

（一）是自稱先人「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從之，寄居各地。」「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斬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負耒耨經之教也。客人多精技擊，客人之技擊，傳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日，相率練習，拳脚刀矛劍挺之術，即古人農隙講武之意也。」

（二）是贊美自己的中原語言、風俗。「客人語言，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讀書之音，則甚正，故初離鄉背井，行經內地，隨處都可相通。」「客人儉勤樸厚，故其人崇禮讓，重廉恥，習勞耐苦，質而有文。」「客人以耕讀爲本，家雖貧必令其子弟讀書，鮮有不識字不知稼穡者，築室墾田，種之植之，耕之穫之，興利除害，什養生息，曾幾何時，遂別成一種風氣矣。」

（三）是宣揚自己的愛國主義，大談特談他們先人在抗元鬥爭中，「沿途據險，與元兵戰，或徒手與元兵搏，全家覆滅，全族覆滅者，殆如恆河沙數。」「終元之世，客人未有出



而作官者，非忠義之後，其孰能之？」「其忠義之心，可謂不因地而殊，不因時而異矣。」

(四)是贊揚自己的婦女。「客人婦女，其先亦纏足也，自經國變，艱苦備嘗，始知纏足之害，厥後生女不論貧富，皆以纏足為戒。自幼至長，教以立身持家之道，其于歸夫家，凡耕種樵牧井山炊爨紡織縫紉之事，皆能一身兼之。事翁姑，教兒女，經理家政，井井有條，其聰明才力直勝於男子矣，夫豈他處之婦女所可及哉。及客人之婦女，未有為娼妓者，雖曰禮教自持，亦由其勤儉足以自立也。」

(五)最後，鄭重提出「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所謂「客吾所客」者，表明客家這一群體已建立起「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歐陽修語)的族群意識，藉以保持群體共同的社會、文化特點和價值觀念。客家人這種主觀意識上的特徵：首先是強調自己的出身中原，是「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講的是屬於中原語言的客家話；「風俗儉勤樸厚，崇禮讓，重廉恥，習勞耐苦，質而有文」；「以耕讀為本，家雖貧亦必令其子弟讀書」。其次認為自己是被輕視迫害的一群人，客家人的祖先在宋亡之後「沿途據險，與元兵戰」，造成此後遭受迫害的命運。另外，離開故土的客居命運對客家人精神的影響還表現在社會生活上。客家人入居異地，必然需要佔領生存空間，從而引起生態上的壓力增加，生存競爭加劇。這輕則引起土著的排擠壓迫，重則發生流血衝突。在客家歷史上死傷幾十萬人的土客大械鬥，客家被辱稱為「猪家」，客家歷史上具有防衛功能，堅如城堡的住房……土樓等等，都足以說明當年客家受歧視的程度和社會環境的險惡。

其三忍為自己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報本追源的愛國愛鄉精神，曾經在歷史上作出很多的貢獻。具有剛毅性格，受過中原文化傳統薰陶的客家人在客居的困境中並沒有消沉，他們「窮則思變，困則謀通」(王弼《周易·困卦》注)，積極向上，開拓進取，在生存危機中奮發圖強，開創了一條新的客家康莊大道。客家進取之路主要有兩條：一是大興文教，發憤讀書。二是跨海出洋。客家人就是依靠這種精神力量來開創未來，譜寫客家的生存史和創業史的。同時，客家人也深深體會到，僅有開拓進取的人生價值取向不夠，還必須有刻苦耐勞，不畏艱辛的堅忍卓絕品格，理想才能實現。為了在艱難中奮起，客家人寧願吃大苦，耐大勞，以自己的血汗來改變命運。另外，客家人完全承繼中國古代報本追遠的人文傳統。在長期遷徙中，把中原漢族的宗法觀念，宗族傳統帶到他們的顛沛生活中。唯有如此，他們才能依血緣共同體的力量生存下來。再把這種報本追遠的古老傳統轉化為具有活生生的現實內容的愛國愛鄉精神。

其後，大約在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至二十五年(一八二〇)間，鎮平(今蕉嶺)人黃釗著《石窟一徵》一書。「石窟」為鎮平縣治所在，「一徵」是作者謙稱自己的作品為私修之地方史書。全書凡九卷，特辟二卷「方言」詳細敘錄客家方言。強調「客人聲音多合於周德清《中原音韻》」「研究客家方言者，必以此書為鼻祖矣。」(註十七)溫仲和後來編著《光緒嘉應州志》卷七「方言」即被認為以此為藍本。

#### 四、近代的客家研究

明末清初，客家人競向海外謀生，經營工商，實力速增



，業績斐然，引起人們的注意。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運動，歷時十四載，縱橫十八省，震驚中外。其主要將領和基本力量，均為客家子弟，客家方言成為太平天國的「國語」。中外人士為之矚目，引起了對客家研究的濃厚興趣。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廣東西路發生六邑（高要、高明、鶴山、恩平、新寧）土客大械鬥，械鬥逐步升級，急劇蔓延，歷時十二載，雙方死傷散亡者，達五、六十萬之衆。對於這場慘劇，有些人仍不以人民團結為重，反而誣稱客家人為「客賊」，《新會縣志》和《四會縣志》更書之為帶「彡」旁的「客」字。這一事件引起輿論界和學術界的強烈反響，客家源流問題研究，便猶如春潮般一浪高過一浪。

這些本地（Puntis）與客家（Hakkas）對立的事件也特別引起歐美人對客家人的注目，遂開始對客家問題的研究。一八六八年梅耶斯（W.P. Meyers）首次提出了土著與客家差異的報告（註十八）。接著，艾特爾（E.J. Eitel），皮頓（Ch. Peton）等也相繼發表關於客家的報告（註十九）。此後有三十多位中外學者對客家問題作了初步探討，並發表了文章。他們往往把客家人看作同漢族並列的單一民族，視客家為少數民族。後來，康普爾（G. Campbell）實地調查梅縣地區，發表文章說：「客家是純粹承襲了中國人血統的世族。」「當時漢族的土著人認為客家是漢族同瑤族的混血種，其實，客家並非混血種，而是具有純正血統的漢族，不備比少數民族優秀，而且比土著漢族優秀，他們是有來歷的中原王朝的後裔。」（註二十）。自此之後，中外學者都因襲了康普爾的看法。

其後，公然貶斥或歧視客家人的事件又屢有發生，如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順德人黃節的《廣東鄉土歷史》稱客家人「非粵種，亦非漢種」，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上海出版的鳥耳葛德的英文版《世界地理》稱客家為「野蠻的部落」，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廣東《建設周刊》載文侮辱客家人人格，等等。這類事件引起客家人更大的不滿，也再度引起輿論界和學術界的嘩然。在此期間，「客家源流研究會」、「客家源流調查會」之類的社團組織紛紛成立；大批學者如顧頡剛、洪煥蓮、羅常培、章太炎、鍾用和、黃遵憲等都熱心倡導並努力進行客家研究；一些正式的研究機構，如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更是熱心倡導，精心組織，並委派羅香林編輯《客家史料叢刊》及實地考察客家歷史和文化；旅居海外的各家人亦紛紛成立社團，連絡情誼，編纂專書，闡揚客家源流和文化風俗，與大陸客研究遙相呼應；當時的粵地軍政要人如陳銘樞等，親自出面調停、處理事件，無形中對客家研究發生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切，把客家研究推上鼎盛時期。

這一時期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幾乎觸及客家的所有問題，而且成果豐碩。據現有資料統計，這一時期大陸出版的客家研究著作有五十餘部，實屬空前。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當推集客家研究大成的羅香林，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與於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二書。前書是羅氏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並在自己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這本書對客家的源流、遷徙之原因與路線、人口分佈和語言特點等作了詳盡的考證和闡釋。儘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其某些論述欠全面



，某些觀點尚需商榷，但仍不失為當時研究客家最具權威感的著作「如欲從事客家研究，應以該書為常識性的入門手冊」。(註二十二)後書則再次復述前書的觀點；而強調客家人南遷之後「以在當時所處的地域為南唐以南，王閩以西，馬楚以東，南漢以北地帶，即閩粵贛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各個割據政權的融化勢力，既不能支配他們，而適以環繞他們，使他們保持了傳統的語言和習俗。而與其四圍的民系相較，則一者已為各別混化，一者仍為純粹自體，對照起來，便覺二者有點不同。因此而他人遂覺其另一系統，而其人亦自覺其是另一系統，這樣在意識上和觀念上便成了客家這個民系。」(註二十三)數十年來，中外學者發表的客家問題的論著文章，大多數都是依據這兩本書的觀點。認為客家人是中原血統最純正的正統漢人的後裔。

日本學者中川學首先對羅香林研究客家源流的方針，提出批評意見，先後寫了〈關於客家在中國及東南亞的歷史地位〉(一九七三)、〈華人社會與客家史研究的現代課題〉(一九七四)、〈中國客家史研究的新動向〉(一九七七)等文章。集中批判了羅香林為代表的以血緣關係為研究取向的客家觀。在中川看來，羅香林客家觀的內涵，主要是以「客家為中華正統文化的精華，自我認定為繼承古代中原華夏道統、法統的正統思想」為主要精神。他認為羅氏客家研究的根本動機「終究是離不開把客家的源流看作是支撐古代中原王朝的一股力量」，對羅香林從各姓族譜調查客家姓氏源流，把各姓的遠祖一直追溯到周或晉的古代王朝的王室和官宦世家，中川認為主要是「證明遠祖到自己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羅氏的主旨決不是單純探討文化價值的中華倫理

秩序，而是以探討更為具象的漢人血統為其問題取向，」並指出這種強調血緣關係的研究，是「人種主義的排他性。」

筆者從周達生《客家文化考》(一九八一)一文中得此訊息(註二十三)，再取得中川著作原文，於是在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出版的《臺灣的客家人》一書中特設〈客家源流的另一觀點〉一章詳細介紹了中川學的觀點，並對自已過去採用羅香林觀點作為探討依據，進行一番省思。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羅氏批駁對客家的蔑視以及與此有關的資料，是正確而必須如此做的。筆者也在肯定羅香林對客家研究的貢獻的同時，認為羅香林客家觀，是對抗當時一些「客家非漢族說」和「客家為漢族與苗、瑤、壯、蛋等族的混血種說」而來的，這種構想完全是起自「漢族」對「夷狄」，「中央」對「邊疆」的民族觀，以純血、混血為人種區分標準的一種「人種主義」為其出發點，因而在論點上很難擺脫民族自我中心偏見的陰影。(註二十四)總而言之，近代客家研究的成果，大體上勾勒出客家的源流、系統、分佈、語言特點及遷徙的原因與遷徙路線，不僅為其後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且對消除歷史誤會，緩和土客矛盾、制止土客械鬥、振奮客家精神、弘揚中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 五、日據時期的客語研究

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對臺灣地區的語言一直很關心，不但編了好幾冊內容完整的閩南語辭書，而且對客家話(日本人筆下的「廣東話」)也不吝研究。以下的敘述是依據鍾勞富以橋本萬太郎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的「A critical



Survey of hakka studies] (原書 I、II 節) 為基礎的說明。(註二十五)

第一部日本版的客家會話是 Shiba 一九一五 (志波吉太郎《廣東語會話篇》)，此書為日後日本人做臺灣地區的漢語方言研究樹立了假名 (kana) 拼音方式及聲調標記法。雖然此書引言中說是以四縣話為準，而實際上卻是海陸客家，因為去聲也分了陰陽。同時，此時的調號錯誤百出，不足以採信。

四年之後，在日本出現了第二冊客語教材：Ryu 一九一九 (劉克明《廣東語集成》)，作者為臺灣人。書分三部分：語音描述，文法分析，和二十二課的對話練習。語音以桃園、新竹、苗栗、及高屏地區的四縣話為準，去聲不分陰陽，採假名拼音。此書對變調有很詳細的描述，是為其優點。

在日本的客語著作中，最優秀的應是 Kan 一九三三 (菅向榮《標準廣東語典》)。Kan 是 Ryu 的學生，本身是客家人，因此對客家語語法的分析很透徹，可惜調類的記音前後不一致。該書載有三十八課的對話練習，無不精心挑選，書後並附有字表及客家諺語，音則採用四縣客家語為準。

日本人編纂的唯一字典是 Sootokunfu (臺灣總督府) 一九三〇 (《廣東語辭典》)，(註二十六) 用的是四縣話 (長樂方言)，載有二千五百個日本字，用漢字書寫，客語解釋，假名拼音。楊鏡汀一九九五整理了七千多個有音無字的音，以補該字典之不足。

日據時期的另一本客日字典是中國人菅向榮於一九三三

年所編的《標準廣東語典》(按：此書即 Kan 一九三三)，內容實為客語句法綱要，全書分三篇：音調、語法、與會話。其中語法又分為十二章，幾乎所有的詞數均有簡略之討論，而會話有三十八章，所論之主題範圍很廣。書後並附有臺灣俚諺 (實為客家諺語) 及單語詞彙，內容極具參考價值，即使以今日眼光來看，其語法分析依然頗有助益。

## 六、臺灣的客家研究

光復後，臺灣所受的戰爭災害正待復興，整個社會都為生活而奔波忙碌，沒有談及文化建設，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客家研究。臺灣的客家研究是當時新近出大陸來臺的「新客」所倡導的。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中華日報駐苗栗記者梅縣白渡堡人謝樹新在苗栗刊行「苗友」雜誌，專門報導客家典故。刊行以來客籍人士都認為可談性高，惟刊名侷限於苗栗，嫌其狹隘，無法獲得全球客家人的認同，乃於五十二年三月改名為「中原」雜誌，以示客人出身中原永不忘本之義。「中原」為月刊，純粹介紹宏揚客家傳統的倫理道德；客家風俗、習慣、語言、客家源流，客家居地文物，名勝，客家先賢，先烈忠孝節義掌故；客家人文、歌謠、及有關客家先人初定居於閩粵贛各地筆路藍縷的創業垂統；以及遠走海外從事發展、闢地開天，艱辛締造的事蹟；民國前後客家先賢先烈獻身革命事業的建樹，以及一系列抗虜、抗敵、抗暴精神之表著等，為其主要旨趣。其所刊載客家風土，掌故之篇什，清新雋逸有類小品文，又有類名人傳記；有的令人風儀，有的令人感奮，有的令人展顏，有的令人噴飯捧腹，恍如八珍在前，美不勝食。客家詩圃亦稱中原詩圃，選載頗嚴，



古今人詩鈔均有，兼有詩話，例如人境廬及丘倉海、羅卓英、梁伯聰「梅縣風詠」等遺作，均為淺顯雋上之作。時人作品如「疏桐高館詩」、「曇花詩草」、「海上吟草」等佳作，亦均為一時之選。所登載之客家歌謠，可說十分豐富；情歌、勸世歌、招親歌、從軍歌、戒嫖賭歌及一般山歌，有怡情抒懷的，有教育意義的所佔份量也不少，更有創新歌謠，每期一欄提供音樂工作者參考。以其內容之多樣化，廣受全球各地客屬人士的喜愛，每期發行量有二千五百份之多。

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又將過去「苗友」「中原」所刊有關客家文化之資料，分為客家語言研究、客家話、客家掌故、客家風土、客家山歌瑣談、客家歌謠等六類，整編為《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此後，原則上以每兩年結集一次，至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共出刊七集。其出刊情形是：五十六年二月出刊第二集，五十八年五月出刊第三集，六十年三月出刊第四集，六十年五月出刊第五集，六十五年九月出刊第六集，七十年十二月出刊第七集。這當中影響比較深遠的有黃基正《客家語言研究》都十餘萬言，刊在第一、二集，所附之《客家字音表》則刊在第二、三集。此書為作者民國五十六年〈苗栗縣志卷二人文志語言篇〉之擴充，以自創的改良式注音符號為音標，先就聲母，韻母的發音方式加以描述，再繼以客語語音與國語語音之比較，其次是方言詞彙。完全是以中古音為基準，以比較中古音系與其時音系的發展為主軸，點出客家話與其他方言之區別。本書為客家人在臺灣最早發表的一本描述介紹客家話的工具書，功勞很大。筆者於民國六十七年出版《客家人》一書，其中〈客家話的面面觀〉一篇完全襲用本書的看法及音標，包括音系的來源，古今

音的參照，及陰陽對轉等等。

中原雜誌又把該刊所刊之客家歌謠輯錄為《客家歌謠專輯》，一共出刊七輯。又在民國六十二年出版《中原客家禮俗實用範例專輯》一冊。

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早在日據時期的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由時任臺灣銀行科長的日本人有元剛譯成日文發行，但在臺灣並不通行；遲至民國六十四年始由臺北古亭書屋印行出版中文本。臺灣最早發行客家書籍的是時任屏東縣立長治中學校長後任逢甲大學教授的郭壽華，於民國五十二年自印《客族源流新志》交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經銷。其次是服務高雄警察界的李關仁，於民國六十二年自印發行的《客家人》。惟這兩本書篇幅都沒超過一〇〇頁，屬於小冊子型態。鄉土誌方面則鍾壬壽於民國六十二年著《六堆客家鄉土誌》，由常青出版社出版。曾秀氣於民國六十六年編《六堆英華》由美和出版社出版。

筆者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著《客家人》一書都二十萬言由臺北聯亞出版社出版。論者評為「由於此書為近年來臺灣第一本關於客家人源流、歷史的專書，甚獲大眾垂青。」（註二十七）此後，在臺灣出版的主要客家專著有民國六十九年廖偉光《客家民系研究》，七十一年鄧迅之《客家源流研究》，七十二夏忠堅《隱藏的一群：臺灣客庄和客庄教會的客家人》，七十四年雨青《客家人尋根》，七十八年陳運棟《臺灣的客家人》，八十年鍾孝上《客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八十年江運貴《客家志》（英文版），八十年徐正光編《徘徊於族群與現實間：客家社會文化》，八十年陳運棟《臺灣的客家禮俗》，八十年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力會編《新客



家人》，八十一年高宗熹編《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八十二年楊國鑫《臺灣客家》，八十二年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臺灣客家人新論》，八十二年黃秋芳《臺灣客家生活記事》，八十三年戴興明、邱浩然編《客家文化論叢》，八十四年彭欽清《心懷客家》，八十四年何來美《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四年簡榮聰《臺灣客家農村生活與農具》，八十四年游日正編《傳統客家建築篇》，《客家生活篇》兩書，八十五年董忠司主編《臺灣客家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八十六年臺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客家民俗文化》，八十六年鄧榮坤、李勝良合編《臺灣新客家人》。

以上有關討論客家風俗、源流與族群特質的專著，大多是「導引」、「簡介」式的扁章。解嚴前的專著以羅香林的觀點為主；一如前述，羅香林研究的基本論點是以譜牒為中心。羅認為族群的形成勢必是具有同一歷史根源的共同体，因此探討「客家人的淵源何在」，便成了最重要的研究課題。羅的兩本集大成的專著花了許多篇幅詳述客家族群歷史淵源，遷徙路線，並舉證歷歷的指出客家人在語言、食物或是服飾等的特色與中原人士的相似性，用來證明客家人絕對是晉室南遷之後的結果。換言之，羅的研究重點，是要證明客家並非土生土長的南方民族，而是如假包換的「漢族正統」、「中原貴胄」。其研究上的這種論點有人批判為：不但預設了族群必定有單一的源頭，帶有相當濃厚的「族群一元演化論」的意味；同時也明顯的透露出論述者漢族中心的研究立場（註二十八）。筆者於六十七年出版的《客家人》一書亦跟隨羅香林的基本論點，以譜牒作為研究，理解客家族群的基本方法與架構。這是因為當所能看到的資料僅有《客家研

究導論》、《中原文化叢書》一集至六集六冊，《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錄實》以及一些本省或南洋各地同鄉會，客屬總會的特刊。這些資料所介紹的客家研究的基本論點幾乎是清一色羅的論點，只好就此論點充實其研究內容與規模。此後，接觸日本方面的客家研究著作，方發現羅基本論點難免具有「人種主義的排他性」，而難以擺脫民族自我中心偏見的陰影。經過一番省思之後，認為客家人的所以始終以為自己是中華文明的正統繼承者，不能像羅一般從血緣上來探討「漢族正統」或「中原貴胄」；而當從文化上來考量。客家人主張他們自己是客家的論據不在於客觀特徵，而在於跟主觀意識有關的特徵，例如以傳統藍布大衫為代表的服飾文化；以香、肥、鹹三大味覺見長的客家菜為代表的食文化；以土樓、圍樓、圍墾屋為代表的民居文化；以聚族而居為根本的血緣家族制度；以唐宋中原古音為基礎的客家方言；以民間傳說「劉三妹」為代表的客家山歌；以多次葬為特色的喪葬制度；以祖先崇拜為優位的宗教信仰；以佛教優位功德性優於咒術性的功德儀節；以讀書為立家之本的教育思想；以刻苦耐、進取開拓、熱愛自由、反抗壓迫、團結互助、親和禮讓為主體的客家精神。我們不能說這種特徵大部份為客家所獨有；像這樣的傾向在漢族裏頭的其他族群裏也有，只是客家的這種主觀意識特別強烈的表現出來。

民國七十九年年尾，「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HAP A）成立，首任會長鍾肇政提出「新个客家人」觀念、撰文謂：「新个客家人之出現，此其時矣！我們雖未敢以此自許，然而我們確不願徒然陶醉於過去創造歷史的萬丈光芒中，更不願自滿於以往英才輩出並管領風騷；我們所深信不疑者



，厥為客家潛力至今猶存。在此世局詭譎，青商會擾攘，新的人文景觀亟待建立之際，我們願意為尋回我們的尊嚴，再創我們的光輝而努力，更願意與其他族群……不論福佬，各省抑原住民各族，攜手同心，為我們大家的光明未來而戮力以赴。」（註二十九）從此，許多年輕一輩的客家研究者在此「新个客家人」概念下，對傳統客家研究過於追究祖籍、源流考的研究路徑有所反省，並意圖建構出嶄新的客家論述。開始呼籲臺灣客家人不要再沈溺在過去歷史的光榮中，而應積極投入當代社會。不過所謂「新个客家人」的素質究竟何所指？截至目前為止，除了出現過一些激昂振奮的語句，像是「新的胸襟、識見與行動」、「早日揚棄自卑過客心態」、「要做臺灣的主人，不是客人」之外，卻未見實踐「新个客家人」的具體形像或內容。此外這些新的客家研究固然不再強調自己族群的血統，根源，不過其論點仍有不少值得玩味之處。首先是泛客家現象；把客家族群形成的時空概念任意追溯或擴大；對古今名人或偉人，在沒有確據的情況下，隨意將其列為客家人。例如不少客籍作者在行文當中，時時不忘指出李登輝、鄧小平、李光耀、邱創煥、吳伯雄等政治人物的客籍身分。就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某種「挾名人以自重」的心態，不過若是了解客家在臺灣歷史上處於相對少數的族群生存經驗，以及一般仍有「客家人只懂得保鄉衛土，卻不關心國家社會等公衆事務」的刻板印象，便不難理解為什麼諸多客家篇什至今乃需要大打名人牌，藉以說明存在的合理性了。其次為盲目追求學術突破，輕易否定前人（主要是羅香林）學術成果，似乎客家方面的學術研究只有從本質上否定羅香林的觀點，才能有所突破。其三為貶低，否定譜

牒的作用；片面強調田野調查，把它當作客家研究的萬能法寶。他們雖然反對譜牒式的族群討論，卻會刻意強調某些他們認定為客家意識的特徵，像是「硬頸精神」、「耕讀傳家」、「團結」、「特別重視歷史傳統」等等。這固然在說明客家族群的認同（identity）上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學者也指出；這種說法的前提基本上是預設了族群的人格，文化或體質上的特徵，即便是經過了世代的更迭仍會保持下去；換言之，他們認為族群內部的特質必是恆常穩定，不變的。這種對族群特質的理解，不僅與目前絕大多數的族群理論相違；同時在現階段的臺灣社會，一再的提倡單一族群的獨特性，固然有助於族群內部的團結，但也可能只會加深他人對該族群的刻板印象與成見。

五十年來臺灣的客家話研究是由外國傳教士開啓端緒的。民國四十年代，原在大陸客家地區傳教的天主教美國馬利諾外方教會的神父、修女到臺灣來傳教，引進了許多年輕一輩的傳教人員來臺，為了學客家話他們帶來了諸如法籍神父Charles Rey所編的《客法大辭典》等的客家話教材。同時為了適時提供英文版的工具書，乃由Guerrino Mascarno（滿思謙）所領導的包含吉愛慈、梁木森、陳俊茂及邱全漳等人的編輯群，花了兩年的時間，終於在民國四十八年由光啓出版社出版了《英客大字典》（English Hakka Dictionary），共六二〇頁另外七頁的附錄。這本字典取用苗栗地區的四縣客家話為發音的基準，用Rey的拼音字母標音，不過另加海陸客語的參照，因此通行於臺灣的大部份客家方言區。全字典採用了一三、二七一，共有二〇、〇〇〇個的用語，內容很充實，只是主題是英文，固然對西方人



士學習客家語的助益很大，但對一般客家人而言，價值似乎也僅足於客語語彙，記音的層面，因此並不很通行。此後，客語字典詞書沈寂一陣，直到民國八十年代以後，詞書的編纂才熱絡起來。

民國八十一年，中原週刊主編的《客家辭典》是由徐運德、黃緯禎統合之下所完成的，撰述委員有楊政男、徐清明、龔萬灶、宋聰正等人。他們的選詞標準，以苗栗一帶有的常用客家字詞為主，標註時以萬國音標及改良式注音符號兩個注音系統同時並列。依羅肇錦的序這本辭典是「漢人遷臺以來第一部與客家人生活結合在一起的辭典」，蒐集的重點放在「客家獨有」的字詞上。遇到有音無字時，依五個原則：(1)考溯本字，如「著」；(2)採俗字，如「做」(他)；(3)採堪用字，如「逐」「遂」；(4)採同源字，如「羊」；(5)借字，如「忒」、「歸」。如尚有存疑，則付之闕如。此書前有各音標對照表：同音字表，然後依 Pi, Pe, Pa...等順序排列，這種排列法大異於以前的字典排列法，查閱較為不易。再者每一項只取詞，而不列例句，如「泌飯」註「將飯中水瀝乾」，對包括客家人本身在內的許多人而言，這種解釋是不夠的，因而相當程度的阻礙了此辭典的實用性。然而，就其編纂毅力及識見而言，這一本辭典依然有其功能在。運用此一辭典時，別忘了多用同音字表，這裏的同音字表，相當於國語客語的對應字典，一般用字的唸法，都可以在同音字表找到。至於特殊用法的詞彙，則是這本辭典的最大特色，所以它是一本文化性極強的客語工具書。

劉添珍民國八十一年出版的《常用客話字典》是手稿影印本，並沒有說明發音是依那個方言，但作者方音是台灣南

部的六堆方言。這是一部為非客籍人士學客字音所編寫的字典，所收詞彙大都是客語國語都可以對應的字才收錄進去，至於客家所獨有國語閩南語所沒有的則收錄較少。是一本工具性的字典。文化性稍嫌不夠。本書一大特色是用自己綜合的羅馬拼音和萬國音標符號，聲母有B, C, CH, D, F, G, H, J, K, L, M, N, NG, P, S, T, TS, WI, Z共有十九個，韻母單元音有A, E, I, O, U, YU六個，入聲尾用-B, -D, -G三個。聲調分平升，低沈，俯切，吊入四聲，然後俯切又分下俯，切割兩個，吊入又分高吊、斷入兩個，一共六個調。欲使用本字典須先熟悉這套符號系統才能運用自如。

李盛發著民國八十六年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題為《客家話讀音同音詞彙》，實具有字典功能，內容與劉添珍《常用客話字典》呈互補現象，因為李書完全是以客家特有的常用詞彙為基礎，這點比較接近《客話辭典》，不同的是：李書包容性較大，以北京話為本的客語詞彙也兼收。此書前面雖然有音標表，卻沒有進一步說明音系，也沒有註明是以何方音為主，是為弱點。然而就實用性而論，本書內容已足夠供平時查閱。

在描述語言學方面，民國四十六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楊時逢《桃園客家方言》，是國內第一本用現代語音學理論，按中國式的語言研究就聲母，韻母，聲調結構做系統分析的客家話著作。全書用萬國音標記音，桃園的四縣話和海陸話為記音根據，內容分(1)語音分析，(2)本地音韻，(3)比較音韻，(4)臺灣客家話。臺灣客家話部份有故事和詞彙，語料非常豐富；並附有索引方便查閱。作者於民國六十年又以美濃地區的客家話為對象有所描述，體例完全



是中規中矩的中國式語言研究傳統，只是規模上比《桃園客家方言》小得很多，沒有故事，也只有少許點綴式的語彙。

羅肇錦為本地專攻客家話的語言學者，民國六十六年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為《瑞金方言》。本書採描寫語音學方式，把江西瑞金的語音系統做詳細描述。全書分六個部份：(1)前言，(2)記音經過及發音人，(3)語音描寫（分聲母、韻母、聲調、連調變化、聲韻調的關係，單字表），(4)比較音韻（分文白異讀比較。瑞金語音與梅縣客語比較，瑞金語音與贛語比較，瑞金語音與中古之比較，綜合比較），(5)結語，(6)附錄（分詞彙、韻文，對話及故事）。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為《客語語法》。本書是以四縣客家話為描述分析對象，用萬國音標描寫，音標後再譯出漢字。分第一章引論，說明研究意義及方法，有音無字及相關資料的處理。第二章語音描寫，分聲母、韻母、聲調、變調、文白、音韻結構。第三章詞法，分概說，字詞與短語，簡單詞與複合詞、構詞類型，詞類問題，體謂詞，謂詞，虛詞。第四章句法，分簡單句複合句、句子成份（分主語、謂語、賓語、表語、定語、狀語、補語），句子類型（陳述句、疑問句、反詰句、祈使句、感歎句、肯定句、否定句、比較句）。第五章客語語法特點，分綜合特點，構詞特點，及句法特點三方面。最後還附錄常用詞彙。

羅肇錦對現代客家話研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舉凡語法、語音、各次方言的比較，客語之異讀，構詞，以至於客語社會地位的提昇，都為學界所肯定。其較通俗的著作為民國七十九年臺原出版社出版的《臺灣的客家話》。此書雖定名為「臺灣的客家話」，並沒有把饒平及詔安的語音系統收入

，僅以四縣及海陸音韻調做描述分析。全書分十八章，緒言談客家話在臺灣的危機；其次說明客家言詞的聲韻調，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另外，臺灣客家話的次方言現象，也做了基本的比較。比較音韻部份，有四縣與海陸的比較，變調及文白差異的比較，客語、國語及中古音的對應。後三章談詞彙結構、構詞法、詞句特點。最後有客語常用虛詞附錄。由於全書所談內涵很廣，對一般應用頗為方便，但語言上的描寫都以萬國音標為主，所以，不熟萬國音標的使用者，必須先熟練前言所標舉的音標使用及對應，才能看懂後面所分析的各種特徵。

呂嵩雁民國八十二年東吳大學的碩士論文，由臺北南天書局影印出版的《臺灣饒平方言》。以調查中壢過嶺里、新竹六家、新竹芎林、苗栗卓蘭、臺中東勢等地的饒平客家話做分析。文分七大部份：第一章導言，說明調查經過，發音人背景，符號使用；第二章語音系統，分聲韻調系統、聲韻調配合關係、聲韻調的音變，文白異讀四個子題；第三章同音字表；第四章比較音韻，饒平方言與中古音、四縣、海陸的比較；第五章分類詞表；第六章附錄故事、諺語、童謠、對話。呂的研究使我們更能理解饒平、四縣、海陸等各客家次方言在音韻系統上的異同，為客家話的研究拓展了更開闊的空間。

在臺灣的客語研究上有所謂「北羅南鍾」，北羅指的是羅肇錦，南鍾指的是鍾榮富是臺灣第一位應用現代音韻理論來分析客家話的學人，雖然迄今尚未見其研究成果結集成書，但由其七十九年起發表的八篇主要論文（註三十）已可窺見其貢獻。另外，作者還有一篇〈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發



展」的論文，評述與討論過去客家話研究的文獻，並從文獻的回顧中，指出客家話研究在記音、構詞與語法三方面幾個未來值得探討的研究主體與方向；頗具啟發性與參考價值（註三十二）。

本會所發行的《臺灣文獻》季刊，在臺灣的客家研究上從未缺席過，早在民國四十一年起就開始登載有關客家研究的篇章。其情形如下：民國四十一年王金蓮〈客家山歌輯註〉（文獻專刊三卷一期）；五十一年張奮前〈客家民系之演化〉（臺灣文獻十三卷四期）；五十六年廖素菊〈臺灣客家婚姻禮俗之研究〉（臺灣文獻十八卷一期）；六十年連文希〈客家入墾臺灣地區考略〉（臺灣文獻二十二卷三期）；六十一年連文希〈客家之南遷東移及其人口流布〉（二十三卷四期）；六十二年連文希〈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紀實〉（臺灣文獻二十五卷一期）；六十四年連文希〈臺灣省客家人物傳資料十二篇〉（臺灣文獻二十六卷一期）；七十年楊越凱〈客家喜慶舊禮俗述略〉（臺灣文獻三十二期四期）；七十二年吳政恆、陳德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客家婚俗座談會紀錄〉（臺灣文獻三十四卷一期）；七十五年陳永寶〈中原古音——閩南話與客家話〉（臺灣文獻三十七卷三期）；石萬壽〈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臺灣文獻三十七卷四期）；七十九年洪麗完〈清代臺灣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文獻四十卷二期）；八十三年簡榮聰〈關西、頭份鎮土地公聯合辦公廟紀實；客家現代鄉村社區人口結構變遷的合祀土地信仰〉（臺灣文獻四十五卷三期）；八十六年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文獻四十八卷二期）。

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指出臺灣客家史的論述，三百年來從方志開始一直到民國七十九年都沒有受到重視，而成為被忽略的研究領域。打從七十九年以後出現了以莊英章、陳運棟為軸心；以尹章義為核心以及師大史、地兩研究所互通聲氣的三個研究群；加上北部的楊鏡汀、黃榮洛、黃卓權，南部的石萬壽以及建築學者的加入，一共可分為六個群體，使得臺灣客家史的研究，逐漸形成規模，其大要如下：(1) 莊英章、陳運棟軸心研究群，共有論文十七篇。其中莊、陳合著者五篇；莊英章三篇；陳運棟六篇；莊、周靈芝合著一篇；王世慶一篇。(2) 臺師大歷史所、地理所，共有論文十四篇。其中施添福五篇，林滿紅二篇；劉妮玲、蔡淵黎、詹素娟、溫振華、劉慧貞、李明賢各一篇。(3) 楊鏡汀、黃榮洛、黃卓權等人，共有論文十五篇。其中黃榮洛、黃卓權各五篇；楊鏡汀四篇；林柏燕一篇。(4) 臺灣南部客家史研究，共有論文三篇。其中石萬壽、湯熙勇、劉正一各一篇。(5) 青年建築學者之研究，共有論文五篇，其中李允斐二篇；梁宇元、邱永章、蘇仁榮各一篇。(6) 尹章義核心研究群，共有論文二十篇。其中尹章義十篇；吳學明四篇；黃煥堯二篇；卓淑娟、洪麗完、陳亦榮各一篇。

尹章義有關臺灣客家各研究群的分類還漏了幾個群，如「臺灣客協(HAPA)研究群」，「客家雜誌研究群」、「臺視鄉親鄉情節目研究群」、「懷寧傳播公司研究群」、「苗栗縣地方史研究群」、「劉還月常民文化學會研究群」等。五十年來臺灣客家研究成果的發表園地，除了本會刊行的《臺灣文獻》季刊外，尚有《臺灣風物》季刊，一直從光復後持續到今日。現已停刊的有《苗栗月刊》，《中原月刊



》，《三臺雜誌》，《楊梅週刊》，《中港溪週刊》。現在仍繼續刊行的有《中原週刊》，《月光山週刊》，《山城週刊》，《六堆雜誌》月刊，《客家之光》月刊，《六堆風雲雜誌》月刊，《彌濃》月刊等。其中《客家雜誌》創刊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原名《客家風雲》，曾提出努力的重點有五：(1)是客家話，客家文化的提倡；(2)是客家史的詮釋；(3)是客家地位的提高；(4)是客家夏令營的興辦；(5)是邀請客家男女學者專家就各種客家問題，舉行座談會。這五項目標就目前來說可以說都已達成初步的成果。該雜誌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進行人事改組，於次年改名為《客家雜誌》，目前已成為客家研究成果最主要的發表園地。

五十年來臺灣客家研究的回顧，還有客家民謠，客家文學及客家學術研討會三項，以篇幅所限，只好從略，有待他日之補充。

## 七、大陸的客家研究

民國三十八年後的四十年間，大陸客家研究滑入低谷，可稱之為「沈寂期」。在此期間，過去對客家研究起過重要作用的社團已不復存在；官方的研究機構沒有著力組織過客家研究；只有極少數學者從自己的愛好出發，作些零打碎敲的探索，發表過數量有限的論文，如何炯的《以梅縣為代表的客家話與北京語的對應規律》、李映川的《梅縣方言的一些詞匯》、何耿豐的《廣東東北部客家方言詞匯點滴》等，真可謂鳳毛麟角。至於專著，更無一部問世。由於缺乏研究，人們在思想上對客家問題普遍缺乏認識，因而經常發生把客家族群當成少數民族來處理的誤會。

進入民國七十年代後，大陸實行開放改革政策，經濟發展迅速。面對現代化大趨勢，客家的歷史命運，又面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嚴峻的歷史關頭。因此，客家問題再度引起大陸學術界和輿論界的廣泛注意，客家研究有了新的轉機。深圳中國客家研究會籌備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客家研究室、北京客家聯誼會、梅州市客家研究中心，嘉應大學客家文化研究室，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客家研究所等研究機構和民間學術團體紛紛成立；《客家民俗》、《客家人》、《客家史與客家人研究》（即今《客家學研究》）等刊物相繼問世；舉行了多次客家研究學術研討會和客家聯誼會，特別是民國七十八年舉行的「廣東梅州客家聯誼會成立慶典暨世界客屬聯誼大會」，有海內外二十七個團（組）參加，與會人數之多，盛況之空前，對客家研究具有潛在的巨大推動作用。

這一切表明，大陸客家研究，已走出低谷，進入振興期。在此期間，一批大陸學者致力於客家研究，發表了一批論文，還出版了詹伯慧的《現代漢語方言》；李如龍、張雙慶的《客贛言調查報告》；陳修的《梅縣客方言研究》；何耿鏞的《客家方言語法研究》；謝永昌的《梅縣客家方言志》；鄧曉華的《客家方言》；古進編以照片為主文字為輔的畫冊《客家人》；張衛東、王洪友合編的《客家研究論集（第一集）》；劉佐泉的《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張衛東的《客家文化》；謝重光主編的《客家文化叢書》十冊；饒任坤、盧其飛主編的《客家歷史文化縱橫談》；黃偉經、劉發青主編的《客家名人錄》（梅州地區第一大卷）；程志遠主編的《客家源流分佈》；房學家的《客家源流探奧》；謝萬陸



的《客家學概論》；羅英祥的《飄洋過海的客家人》；王東的《客家學導論》；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林浩的《客家文化新論》；等等，琳瑯滿目，一片興旺的景象。

## 八、結語

如從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徐旭曾發表《豐湖雜記》算起，客家研究已整整有一九〇年的歷史。在此期間，雖有低潮，但總的說來，中外學者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且成果豐碩，在族群識別，源流探索，以及傳統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樹，尤其是客家話的研究方面建樹特多。臺灣的研究，正由政府，民間及學術機構大力的推行。最近，國立中央大學成立之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本會正在編輯《臺灣客家族群史》；臺北市成立客家中心，高雄市正在興建客家文物館；行政院文建會正委託中興大學研究臺灣各地建立客家文物園區及客家博物館的可行性探討。民間則由各地之客家文化工作者紛紛成立文化工作室鳩集一批年輕的研究從事研究者。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

大陸則雖自民國三十八年起進入低潮長達四十年，然而改革開放之後不到二十年即形成蓬勃發展的景象，論文，出版物一波波的出版。不過由於時代的局限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海峽兩岸的這些研究成果還無法涵蓋客家族群形成前後千百來豐富多彩的客家文化的各方面；換言之，無論從其廣度，或是深度來看，目前的研究程度都還沒有達到系統性和理論性的階段。為了推動客家研究的深入開展，大陸客家學界提出創建「客家學」的主張，筆者認為臺灣的客學界也應該有對應的措施，對客家研究從事理論架構的建立，擴大

研究對象，倡導科際整合，加速對客家一些主要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

### 〔註釋〕

註一：尹章義語，見《臺灣客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臺灣文獻》四十八卷二期，八十六年六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註二：張衛東《客家文化》頁四七，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國文化書院。

註三：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尋》頁五一及頁一五五。一九九四年三月，梅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註四：謝重光《團結、共識、發展……梅州「客家淵源與客家界定」學術研討會紀要》，載《客家雜誌》九十四期頁三二—三三。一九九八年四月，臺北，客家雜誌社。

註五：陳運棟《臺灣的客家人》，頁二四，一九八九，臺北，臺原出版社。

註六：同註五，頁二七。

註七：王育德《臺灣》頁五七，一九七九，東京，臺灣青年社。

註八：陳運棟《客家人》頁六九，一九七八，臺北，聯亞出版社。

註九：連橫《臺灣通史》頁六一，一九八四，臺北，大通書局翻印本。

註十：藍鼎元《平臺紀略》頁五一，一九八七，臺北，大通書局翻印本。

註十一：同註十。

註十二：同註十，頁五二。

註十三：同註十，頁六七。



註十四：同註十，頁六三。

註十五：林師聖〈閩粵分類〉，《臺灣採訪冊》頁三四—三五，一九九四，臺北，大通書局翻印本。

註十六：徐旭曾〈豐湖雜記〉，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編〉頁二九七—二九九，一九九二，臺北，南天書局翻印本。

註十七：古直語，〈述客方言之研究省〉，載《中山大學語歷史周刊》(5)，頁三四五二，一九二八，臺北，文海出版社翻印本。

註十八：據中川學〈華人社會與客家研究現代課題第一節〈前世紀末的客家研究〉〉。載戴國輝編《東南亞細亞華人社會研究》(上)，頁五九—六一，一九七四，東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

註十九：E.J.Eitel: "Ethnological Sketchs of Hakka Chinese" in *Notes and Outline on China and Japan* Vol.I 1867: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in *China Review* Vol.III 1873—74. Ch.Peton: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 in *China Review* Vol.I No.4.1873

註二十：George Cambell: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in *China Recorder* Vol.VIII, 1912. 據中川學云：「本見原文，漢譯本據羅香林之說，是由梅縣出身之鍾魯齋譯所，刊《嘉應》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中川所到的則是《霹靂客屬公會開幕紀念特刊》，一九五一年。係由今幅誠所借閱者。康普爾論文的結論為：「客家確是中國之一種極殊而強有力的族群；其源流及移民，皆可以見其世族之尊重及軍隊之精神，而足以自豪。確可預言。客家將增加其重要部份於其進展程中，而提高中華之人民。」

註二十一：張衛東、王洪友主編《客家研究第一集》，頁二一〇，一九八九，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註二十二：同註二十一，頁四六。

註二十三：周達生〈客家文化考——以衣、食、住、山歌為中心〉，載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第七第一號，頁五八—一三九。鍾肇政所印贈者，無年代及出版地點紀錄。

註二十四：同註五，頁三八—四一。

註二十五：鍾榮富〈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發展〉，為作者接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編號CKF20121與國科會NSC86-2411-H-017-001資助之研究報告。初稿曾宣讀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在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舉行之臺灣母語教學研討會。作者所提供。

註二十六：據楊鏡汀民國八十四年〈廣東語辭典有音無字之整理初稿〉云：此書出版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在此依橋本萬郎之說。

註二十七：鍾榮富語，見註二十五文中之頁一〇。

註二十九：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編《新个客家人》頁二〇—二一，一九九一，臺北，臺原出版社。

註三十：鍾榮富，高雄師範大學教授。其已發表之主要論文有以下各篇：(1)〈論客家話介音的歸屬〉；一九九〇，〈臺灣風物〉四十四卷四期，頁一八九—一九八。(2)〈客家話韻母的結構〉一九九〇，〈漢聲研究〉八卷二期，頁四七—七七。(3)〈客家言詞的〔v〕聲〉一九九一，〈聲韻學論叢〉第三輯頁四三—四五。(4)〈客家方言的唇音異化研究〉一九九四，收於《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頁五七一—五九二。(5)〈客家童謠的文化觀〉一九九四，收於《



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二四—四〇。(6)〈客家話的構詞和音韻關係〉一九九五，收於《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五五—一七六。(7)〈美濃地區客家次方言的音韻現象〉一九九五，收於《臺灣客家語會論文集》頁七九—九四。(8)〈美濃鎮誌語言篇〉一九九七，頁一三七—一四七七。

註三十一：同註二十五，頁一八一—一九。

### 作者簡介

陳運棟，號又龍，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苗栗縣頭份鎮埔桃里向陽書院。新竹師範畢業，四十四年高等考試教育行政人員及格，中國文化大學民華所法學碩士。曾任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教授四十餘年；三臺雜誌總編輯；苗栗縣教育會理事長；苗栗縣陳姓宗親會理事長等職。現任國大代表，大成高中校長。著有《客家人》、《臺灣的客家人》、《臺灣的客家禮俗》、《臺灣人物叢譯》、編有《苗栗竹枝詞》、《頭份鎮誌》、《西湖鄉誌》、《賽夏族史話—矮靈祭》、《內外公館史話》、《苗栗縣寺廟文化之研究》、《客家禮俗之研究》等書，並發表有關臺灣史研究之論文二十餘篇。



